

反读书记

胡文辉 著



廣東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反读书记

胡文辉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反读书记 / 胡文辉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4. 10

(书蠹丛书)

ISBN 978-7-5360-7168-1

I. ①反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856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郑裕敏 刘玮婷 邹蔚昀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反读书记
Fan Dushu Ji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)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7.25 2 插页 |
| 字 数 | 10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2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缘起

我平日读书，若有心得，包括一时触发的感想或可作系联的材料，都习惯批注在书里，此后若有相关发现，也会继续作批注。有些问题积累多了，若比较应景的，或就连缀成文；若比较重要的，或就汇总另存；但多数的零星感想，仍散落在难以数计的书里。而读书之外，时不时也有若干杂感，过去只随手写在零散的信笺或报章上，有些写成了文章，但有些无足轻重，也就付予尘封而已。

后来有一阵，也许是所感渐多，所思渐深，觉得写在纸上不易存留，心念一起，就决定集中写在笔记本上。

对于这些随想，开始时曾套用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，自名为《日思录》，当然有些托大，而且所记并不限于“思”

的成分，也不准确。后来又觉得，这些随想多得于读报、上网、看碟，或旁人之闲言，或一己之杂感，总之都在正式的读书之余，故又拟名为《书外随录》（当然，这些随想虽大体来自阅读之外，但根本上仍是基于阅读的，是平时的阅读经验融会到意识深处，才会偶然地在阅读之外结晶为思想的断片）。最后，想到法人马尔罗的自传《反回忆录》，遂仿其例，名之曰《反读书记》，显得别致，亦有吸引眼球之用。

说起来，《反读书记》这个名目看似有点突兀，却是完全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。据我陆续所留意到的，以“反××”为题的古典诗文乃至专集所在多有：西汉扬雄有《反离骚》，三国王粲有《反金人赞》，西晋孙楚有《反金人铭》，东晋王康琚有《反招隐》，唐代皮日休有《反招魂》，明代吕坤有《反挽歌》，乾隆皇帝有《反李白丁都护歌》，龚自珍有《反祈招》，近代俞樾有《反绝交论》，宁调元有《反饮酒箴》，周大荒有《反三国演义》，陈寅恪有《反落花诗》，甚至，近时日人木田元也有《反哲学入门》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大可理直气壮，不必担心别人讥为标题党了。

此外，还有另一重用意在。

我过去出的书，尤其是《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》《陈寅恪诗笺释》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几种，已有太多的引证，太多的注脚，读者或以“博学”视我誉我。事实上，我本有点担心，那几本书是不是太繁琐了——尽管我相信，那绝不是无意义的繁琐，是必要的繁琐；而结果，我的担心似是多余的，也许，如此繁琐才正符合了时下的知识风气吧，毕竟这是个膜拜钱锺书、言必称《管锥编》的时代。但我并不认为“博学”有多么了不得。如果说我是自负的，那么，读书多并不值得自负；读书虽多，仍没有丧失思考能力，仍能够使书本为我所用，才值得自负。换句话说，掌握了庞杂的材料，但没有被材料所淹没，仍然能超出材料之外，收拾得住，驾驭得住，这才算是我感到自负的地方。

读书是要入乎其内的，但也得出乎其外。有的时候，是需要超脱于读书之上的。并非只有书本里的才是学问，书本之外，处处是现象，处处是问题，处处是材料；而且，往往书本外的种种，更能激活书本里的学问。

叔本华、尼采都看不起“学者”，看不起死读书的人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，不勤于读书，已没有资格做知识分子了，但我们仍应当多体味叔本华、尼

采的话，对于“读书”要保留一分警惕，保持一分距离。

我所以用“反读书”这个名目，就有这些微意在焉。也因此，我有意采取“反学术”的表述方式，引证虽不可避免，但至少做到不加脚注，作文字之裸奔。

就体裁来说，这些随想显然应归入札记的范围。我之所以采取这种体裁，可以说有两方面的理由。

首先是内在的理由：我有太多的其他题目需要写，而这些随想多属于片断性的，以札记体表述出来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是效率最高的写作方式。诚然，所涉及的话题有些很是宏大，本来是需要作专门研究的，可那么多的话题，若都作通盘式的梳理，人生几何，能成就几个呢？我愿意依据思想直觉，或者提出问题，或者直达结论，以供有心的专门家参考。

其次就是外在的理由：这是一个越来越不依赖纸张的时代，发表文字已太容易，世间的文字已太多太多了。我既达不到“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”的境界，作为不断给这个世界增添文字负担的人，至少应当让自己的文字尽量减少些“水分”。对于这些思想碎片，我希望能用尽量少的篇

幅来表达，如此，读者也能用尽量少的时间来接收。

这样的体裁，这样的写法，分析自难面面俱到，材料也未必太严谨，但仅就内涵来说，我敢说是丰富的，甚至比我此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丰富。

以札记的形式表述思想或学问，有容易的地方，也有困难的地方。在文字上，不必太讲究词藻，尤其不必太讲究布局，辞能达意即可，确是容易的；但在内涵上，需要直抒胸臆，直奔主题，非言之有物不可，则又是困难的——就跟美女穿比基尼真空上阵一样，是否“有料”，一目了然，不是人人都适宜的。

札记体的书，中西皆有，中国的多重轶事，偏于趣味性，西方的多重哲理，偏于思想性。我日常留意的事情，可以说二者兼有，因此，这本札记在旨趣上也兼有中西之风，既有趣味性的成分，也有思想性的成分。

这样一来，内容自然就驳杂不纯，可谓一锅大杂烩；但也不无好处，就是求其趣味者，可以得一点思想，求其思想者，又可以得一点趣味。我的奢望，是读者能将它作为有趣味的书来阅读，但将它作为有思想的书来看待。

做学问不用怕艰深晦涩，不用怕别人看不懂；但搞创作，却应当好看，应当让人看懂。（写诗还可以让人看不太懂，但写小说、拍电影总要让人看得懂吧！）

据说爱因斯坦曾对卓别林说：你真了不起，全世界都喜欢看你的表演。卓别林则回答：你更了不起，全世界都看不懂你的著作。

这就是做学问与搞创作的区别。

网名多有妙用新旧典故者，极见民间智慧。通俗的如“哈利波特大”，来自《哈利·波特》；“放倒爱”，来自日

本 AV 女优饭岛爱。高雅的如“脸颇老矣”，来自辛弃疾词“廉颇老矣”；“无柳先生”，来自陶渊明的别号“五柳先生”；“事了扶伊去”，来自李白诗《侠客行》“事了拂衣去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后，家族制度和观念在大陆逐渐消亡，我辈生长红旗下，多不知三代以上事。我自小就有一个印象：祖辈曾开过金铺。年前偶返开平看碉楼，问起父母此事，才知道原来是开过五金铺！（不过，我姨丈家倒真是开过金铺，是不是我下意识地将姨丈家的事当作我家的光荣历史了？）

其实人类所谓历史，其以讹传讹，亦大抵如是。

陕西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案，曾轰动一时，实际上也是一种“造假”与“辨伪”的通俗版本。“造假”必有其动机，必属应时而生，应需而生，华南虎照片是如此，经学史上的伪《古文尚书》也是如此。“打虎派”从摄影技术、网络图片技术乃至植物学角度，质疑华南虎之伪，亦

如宋、明人质疑《古文尚书》，虽有理致，而未有实证；等到发现了华南虎年画，揭出所谓华南虎照片的来历，则亦如清人阎若璩一一揭出《古文尚书》文辞的来源，可谓捉奸在床，无所遁形矣。然而事已至此，周正龙及陕西林业厅仍斥年画为栽赃——真广东人所谓“死鸡撑饭盖”；此又如《古文尚书》一案，既有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的结案陈词，本已铁证如山，但为之“辩诬”者，自清代毛奇龄以来，至今仍未绝也。

辨伪之难，在于辨人心之难耳。

俗语之中，不乏洞察人情的至理。比如“好事都归花大姐，坏事都归毛毛虫”，就有见于人情容易趋向简单化的善恶思维，实即相当于孔圣人弟子子贡所说的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也就是说在世人眼中，善者事事皆善，而恶者事事皆恶也。这种思维，在“文革”时代最为普遍。

又如“自屎勿觉臭”，又作“自家屎不臭”，亦深有见于责人不责己的心理。这种心理，除了表现在个人，在家族，在地区，不也表现在民族、国家层面上吗？凡持“爱

国主义”高调者，多属“自屎勿觉臭”之徒也。

彩票是最低成本的投机形式，因此，也就成为无产阶级的致富乌托邦，成为人民的商业鸦片。贫富的分化程度越严重，缥缈的彩票就越受欢迎。

富豪阶级炒房地产，中产阶级炒股、炒基金、炒期货，无产阶级买彩票——概率是越来越低，投机性是越来越大，但以无产阶级的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投入，除了以小博大，哪有更好的捷径呢？

中古时代翻译的佛经，近代翻译的《圣经》，其译文在遣词造句上都多有生硬之处，与一般汉语迥异。此或由于译者的中文素养未精，不能达到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的境界；或由于有意要保持文本的原汁原味，故宁愿采取直译甚至硬译的方式。然而亦因如此，译经反而能造成一种特别的文体和文风，挟其宗教传布之力，对汉语产生反作用。尤其佛教相传既久，对汉语史的影响尤为巨大。

据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，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任何看见女人而怀有邪念的人，他们心中早已触犯奸淫罪了。”这是道德洁癖的极致。以心论罪，尤甚于以言论罪，在原理上与极权主义已是一丘之貉了。

有一副对联，下联是：“万恶淫为首，论事不论心，论心千古无完人。”这几句话，正与耶稣的意思相对立，我觉得最为通达，最能体现我们古人的“实用理性”。盖人固不妨有色心，但勿有色胆，可矣。

动物的交配据说快得迅雷不及掩耳（有如早泄，或者说无所谓早泄），只有人类才使做爱的时间越拖越长。就生理层面而言，雄性的快感只限于最后“发射”那一瞬间，性爱时间加长，意义并不在生理层面，而在心理层面，无非是显示其雄风而已。因此，伟哥是让男性赢得了虚荣，而让女性落得了实惠。

中西方文明的最佳结晶，一样是香港，一样是奶茶。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饮料是奶茶，比奶茶更好的，是港式

奶茶。

据说近代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过：“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象——那可怎么活呀！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。”那么，我应当庆幸生在有了奶茶之后的世界。

丰乳是我们时代的性感标志。在过去，仅仅是裸露甚至半露的乳房就足以令人销魂了；但在今天，仅仅袒胸露乳是不够的，还得有巨大的体积，才足以吸引见惯春光的“麻甩佬”（粤方言，好色之徒）们。裸露得越多，裸体越容易看到，对男性欲望的刺激作用也就越消退，这可以说是性刺激的边际报酬递减。

因此，豪乳崇拜实为身体裸露时代的衍生物。

法律是外在的、强制的，是一种刚性制度；而道德是内在的、自发的，是一种柔性约束。但另一方面，法律却是低调的、消极的，它仅仅是**不允许**做什么；而道德则是高调的、积极的，它要求的是**应当**做什么。

因此，从形式上说，法律远比道德严格；但从内涵上

说，道德反倒远比法律严格。易言之，法律的特点是低标准、高要求，而道德的特点则是高标准、低要求。

长城的建造是出于国防地理的目的，是消极性的防御；而运河的开掘则是出于政治经济的目的，是积极性的流通。长城可以说形式大于内容，威慑效果大于防卫功能；运河则相反，是内容大于形式，经济效用大于政治形象。

在历史上，长城的实际功用远不能与运河相比；但在今天，长城的形象效应却远远超过了运河。大约因为近代以来外患相继，长城始终被借用为中国人抵抗外来侵略的象征，故终于成为一种过度膨胀的符号吧。

学衡派，是民国时的文化群体，以反对新文化运动著称；新左派，则是当代的文化群体，在经济上反对全球化、市场化，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化、自由化。前者最关注的是思想文化方面，后者最关注的是经济政治方面，只是二者有一个趋同的地方——皆以中国本位为号召，反对西化倾向。但吊诡的是：二者的思想资源实际上也是西方的（学

衡派得力于新人文主义，新左派得力于后现代主义)，甚至比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更加接近于西方，其主导人物大都缺乏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。

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自相矛盾：在知识上脱离本土，食洋不化，凭什么反对西方呢？

在地理上，在经济上，在物质文明上，在大众文化上，在一切的外在方面，世界都越来越一体化了；可是，在我们对这个外在世界的内在认识方面，却越来越分裂了。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有足球，有好莱坞，有麦当劳，有我们熟悉的符号和景观……但我们却越来越依赖 google 或百度了解世间万物的细节。我们可以看见世界的全部，但只能理解世界的片断。

一句话：世界一体化，知识碎片化。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，古已有之，于今尤烈。

西方人习惯饭前喝汤，中国人习惯饭后喝汤——而广东人，则饭前饭后都喝汤。我怀疑广东人饭前喝汤，是受

了西洋风俗影响；但虽然受了西洋影响，却并不放弃本土旧习，于是饭前饭后都喝汤。

趋新而不弃旧，中西合璧，这是岭南人的作风，尤其是香港人的作风。

人生最甜美、最享受的时刻，大抵在将起床未起床之际，在将恋爱未恋爱之际，在将射精未射精之际，在将完稿未完稿之际，在将成名未成名之际……如此类推。

我老家开平将肉叫做“牛”，“吃牛”就是吃肉。我怀疑过去宗族祭祀（拜祠堂）时，以猪牛为牲，祭祀后分肉而食，故有所谓“分猪肉”的俗话；而牲肉当以牛最贵，故开平话又以“吃牛”指代吃肉。

开平有一种薯类，称“猪仔薯”，其得名我父母亦不甚了了。我猜测：可能是当年开平人出洋做“猪仔”时多携此物为食，故而得名；又可能，是开平人多去做“猪仔”，故径以“猪仔”之名称呼这种开平特产？

虽一物一名之微，亦多有历史的积淀也。